

## G 特稿 122

# 从“黑金时代”到“金黄时代”

本报记者 卢翔



饶丰提的手机里，保存着过去矿山开采后的模样。

受访者供图

民，又迅速投入到淘金热中。

杏花村的钨矿比不上三村，黄金资源却相对丰富。15岁那年，初中还没毕业的胡朝中辍学跟着哥哥们寻起了黄金，“那时候，在许多人看来，上不上学好像不重要，能赚钱就行”。

刚开始，淘金客都聚集在赤土河边，“拦截一小段河面，把水抽干，再把河底的泥沙挖个底朝天。”河里挖不出了，又转战到稻田里。到后来，还有淘金船开进赤土河抽沙，用球磨石把砂石碾碎再加上水银后选金。

胡朝中说，私人淘金一般都是同村亲朋组成一个小团伙，淘到了就大家一起分，“最多的时候，一天也就淘出四五十克，每个人分到手的并不多”。

挖矿、淘金带来的经济收益逐渐减少，可野蛮开采导致的巨大破坏才刚刚展露脸面。

接连好多年，三村村民都见不到绿色。或是为了挖钨矿，或是为了烧柴火，山上的植被被砍伐殆尽，目之所及全都是杂乱的黄土和裸露的岩石。流经整个乡镇的赤土河从三村发源，每当下雨天，大量泥土被雨水携卷进河中，从上游到下游全都浑浊不堪。赤土河因此有了“小黄河”的戏称。

就连饶丰提的终身大事，也是由钨矿牵的线。今年56岁的赖华秀本是南康区镜坝镇人，因为跟随采矿的叔叔来到三村，结识了饶丰提，最终在那里结婚生子，“当时嫁到三村，就像是现在嫁了个‘家里有矿’的人。”赖华秀说，那时候不少外村姑娘嫁进了赤土乡，“有矿产，意味着生活条件不会差。”

“沿河的稻田无法种植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河水全都是泥浆，根本不能用于灌溉。”罗亨平说。

钟小花听老一辈人说，以前红桃岭很多地方会冒出清澈的山泉水。可她嫁到红桃岭组后，却从没见过山泉水的踪影，“听人说，是因为采矿掏空了地底”。

比河水变浑、泉水消失更严重的问题，是水质变得有毒。饶小明说，过去许多企业和村民在对钨矿、黄金进行加工提纯时都会用到硫酸和水银，含大量有毒化学物质的废水被直接排入赤土河，“后果就是河水汞含量超标，灌溉出的粮食也没人敢吃。”

2019年，在外漂泊20多年的朱英华回到南康钨矿的所在地，养起了蜜蜂。“我家多年前就迁到了这里，却没有一分土地。矿厂没了，我相当于是个‘黑户’。”朱英华嘴里开着玩笑，表情却有些苦涩——像不少过去的钨矿职工一样，多年来，他对生活一直都感到很迷茫。

## 伤疤

赤土山地面积一万两千多公顷，占了全乡总面积的一大半，素有“八山一水半分田，半分道路和庄园”之称。地少人多、靠山吃山，钨矿和黄金成了当地人改善生活的希冀，却也蒙蔽了他们的双眼。

“我们这批人，既不适应乡村，也不适应城市。”今年50岁的朱英华在南康钨矿出生、长大，他的外公外婆和父亲都是矿厂的职工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朱英华高中毕业后赶上招工，成了南康钨矿招聘的最后一批职工，“那时钨矿质量、数量都不如从前，厂子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

没过几年，朱英华离开钨矿外出务工。他辗转去广东、福建等地，但因为学历不高，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纸箱厂、汽配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打些零工。

“南康最有钱的大多是赤土人，做着最苦力工作的也大多是赤土人。”流传在赣南地区的这句话，是采矿淘金时代后赤土人的两种真实写照，只是前者数量稀少，后者却人数众多。

“过去老百姓不知道黄金在哪儿，也不知道如何开采，因此一直把民谣当玩笑听。”罗亨平说，当钨矿开采热度达到顶峰时，逐渐有一些黄金开采企业来到赤土尝试着挖掘黄金。随着黄金出土的消息不断传来，不少在钨矿折戟的村

民，又迅速投入到淘金热中。

杏花村的钨矿比不上三村，黄金资源却相对丰富。15岁那年，初中还没毕业的胡朝中辍学跟着哥哥们寻起了黄金，“那时候，在许多人看来，上不上学好像不重要，能赚钱就行”。

刚开始，淘金客都聚集在赤土河边，“拦截一小段河面，把水抽干，再把河底的泥沙挖个底朝天。”河里挖不出了，又转战到稻田里。到后来，还有淘金船开进赤土河抽沙，用球磨石把砂石碾碎再加上水银后选金。

胡朝中说，私人淘金一般都是同村亲朋组成一个小团伙，淘到了就大家一起分，“最多的时候，一天也就淘出四五十克，每个人分到手的并不多”。

挖矿、淘金带来的经济收益逐渐减少，可野蛮开采导致的巨大破坏才刚刚展露脸面。

接连好多年，三村村民都见不到绿色。或是为了挖钨矿，或是为了烧柴火，山上的植被被砍伐殆尽，目之所及全都是杂乱的黄土和裸露的岩石。流经整个乡镇的赤土河从三村发源，每当下雨天，大量泥土被雨水携卷进河中，从上游到下游全都浑浊不堪。赤土河因此有了“小黄河”的戏称。

就连饶丰提的终身大事，也是由钨矿牵的线。今年56岁的赖华秀本是南康区镜坝镇人，因为跟随采矿的叔叔来到三村，结识了饶丰提，最终在那里结婚生子，“当时嫁到三村，就像是现在嫁了个‘家里有矿’的人。”赖华秀说，那时候不少外村姑娘嫁进了赤土乡，“有矿产，意味着生活条件不会差。”

“沿河的稻田无法种植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河水全都是泥浆，根本不能用于灌溉。”罗亨平说。

钟小花听老一辈人说，以前红桃岭很多地方会冒出清澈的山泉水。可她嫁到红桃岭组后，却从没见过山泉水的踪影，“听人说，是因为采矿掏空了地底”。

比河水变浑、泉水消失更严重的问题，是水质变得有毒。饶小明说，过去许多企业和村民在对钨矿、黄金进行加工提纯时都会用到硫酸和水银，含大量有毒化学物质的废水被直接排入赤土河，“后果就是河水汞含量超标，灌溉出的粮食也没人敢吃。”

2019年，在外漂泊20多年的朱英华回到南康钨矿的所在地，养起了蜜蜂。“我家多年前就迁到了这里，却没有一分土地。矿厂没了，我相当于是个‘黑户’。”朱英华嘴里开着玩笑，表情却有些苦涩——像不少过去的钨矿职工一样，多年来，他对生活一直都感到很迷茫。

“我们这批人，既不适应乡村，也不适应城市。”今年50岁的朱英华在南康钨矿出生、长大，他的外公外婆和父亲都是矿厂的职工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朱英华高中毕业后赶上招工，成了南康钨矿招聘的最后一批职工，“那时钨矿质量、数量都不如从前，厂子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

没过几年，朱英华离开钨矿外出务工。他辗转去广东、福建等地，但因为学历不高，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纸箱厂、汽配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打些零工。

“南康最有钱的大多是赤土人，做着最苦力工作的也大多是赤土人。”流传在赣南地区的这句话，是采矿淘金时代后赤土人的两种真实写照，只是前者数量稀少，后者却人数众多。

“过去老百姓不知道黄金在哪儿，也不知道如何开采，因此一直把民谣当玩笑听。”罗亨平说，当钨矿开采热度达到顶峰时，逐渐有一些黄金开采企业来到赤土尝试着挖掘黄金。随着黄金出土的消息不断传来，不少在钨矿折戟的村

民，又迅速投入到淘金热中。

杏花村的钨矿比不上三村，黄金资源却相对丰富。15岁那年，初中还没毕业的胡朝中辍学跟着哥哥们寻起了黄金，“那时候，在许多人看来，上不上学好像不重要，能赚钱就行”。

刚开始，淘金客都聚集在赤土河边，“拦截一小段河面，把水抽干，再把河底的泥沙挖个底朝天。”河里挖不出了，又转战到稻田里。到后来，还有淘金船开进赤土河抽沙，用球磨石把砂石碾碎再加上水银后选金。

胡朝中说，私人淘金一般都是同村亲朋组成一个小团伙，淘到了就大家一起分，“最多的时候，一天也就淘出四五十克，每个人分到手的并不多”。

挖矿、淘金带来的经济收益逐渐减少，可野蛮开采导致的巨大破坏才刚刚展露脸面。

接连好多年，三村村民都见不到绿色。或是为了挖钨矿，或是为了烧柴火，山上的植被被砍伐殆尽，目之所及全都是杂乱的黄土和裸露的岩石。流经整个乡镇的赤土河从三村发源，每当下雨天，大量泥土被雨水携卷进河中，从上游到下游全都浑浊不堪。赤土河因此有了“小黄河”的戏称。

就连饶丰提的终身大事，也是由钨矿牵的线。今年56岁的赖华秀本是南康区镜坝镇人，因为跟随采矿的叔叔来到三村，结识了饶丰提，最终在那里结婚生子，“当时嫁到三村，就像是现在嫁了个‘家里有矿’的人。”赖华秀说，那时候不少外村姑娘嫁进了赤土乡，“有矿产，意味着生活条件不会差。”

“沿河的稻田无法种植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河水全都是泥浆，根本不能用于灌溉。”罗亨平说。

钟小花听老一辈人说，以前红桃岭很多地方会冒出清澈的山泉水。可她嫁到红桃岭组后，却从没见过山泉水的踪影，“听人说，是因为采矿掏空了地底”。

比河水变浑、泉水消失更严重的问题，是水质变得有毒。饶小明说，过去许多企业和村民在对钨矿、黄金进行加工提纯时都会用到硫酸和水银，含大量有毒化学物质的废水被直接排入赤土河，“后果就是河水汞含量超标，灌溉出的粮食也没人敢吃。”

2019年，在外漂泊20多年的朱英华回到南康钨矿的所在地，养起了蜜蜂。“我家多年前就迁到了这里，却没有一分土地。矿厂没了，我相当于是个‘黑户’。”朱英华嘴里开着玩笑，表情却有些苦涩——像不少过去的钨矿职工一样，多年来，他对生活一直都感到很迷茫。

“我们这批人，既不适应乡村，也不适应城市。”今年50岁的朱英华在南康钨矿出生、长大，他的外公外婆和父亲都是矿厂的职工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朱英华高中毕业后赶上招工，成了南康钨矿招聘的最后一批职工，“那时钨矿质量、数量都不如从前，厂子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

没过几年，朱英华离开钨矿外出务工。他辗转去广东、福建等地，但因为学历不高，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纸箱厂、汽配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打些零工。

“南康最有钱的大多是赤土人，做着最苦力工作的也大多是赤土人。”流传在赣南地区的这句话，是采矿淘金时代后赤土人的两种真实写照，只是前者数量稀少，后者却人数众多。

“过去老百姓不知道黄金在哪儿，也不知道如何开采，因此一直把民谣当玩笑听。”罗亨平说，当钨矿开采热度达到顶峰时，逐渐有一些黄金开采企业来到赤土尝试着挖掘黄金。随着黄金出土的消息不断传来，不少在钨矿折戟的村

民，又迅速投入到淘金热中。

杏花村的钨矿比不上三村，黄金资源却相对丰富。15岁那年，初中还没毕业的胡朝中辍学跟着哥哥们寻起了黄金，“那时候，在许多人看来，上不上学好像不重要，能赚钱就行”。

刚开始，淘金客都聚集在赤土河边，“拦截一小段河面，把水抽干，再把河底的泥沙挖个底朝天。”河里挖不出了，又转战到稻田里。到后来，还有淘金船开进赤土河抽沙，用球磨石把砂石碾碎再加上水银后选金。

胡朝中说，私人淘金一般都是同村亲朋组成一个小团伙，淘到了就大家一起分，“最多的时候，一天也就淘出四五十克，每个人分到手的并不多”。

挖矿、淘金带来的经济收益逐渐减少，可野蛮开采导致的巨大破坏才刚刚展露脸面。

接连好多年，三村村民都见不到绿色。或是为了挖钨矿，或是为了烧柴火，山上的植被被砍伐殆尽，目之所及全都是杂乱的黄土和裸露的岩石。流经整个乡镇的赤土河从三村发源，每当下雨天，大量泥土被雨水携卷进河中，从上游到下游全都浑浊不堪。赤土河因此有了“小黄河”的戏称。

就连饶丰提的终身大事，也是由钨矿牵的线。今年56岁的赖华秀本是南康区镜坝镇人，因为跟随采矿的叔叔来到三村，结识了饶丰提，最终在那里结婚生子，“当时嫁到三村，就像是现在嫁了个‘家里有矿’的人。”赖华秀说，那时候不少外村姑娘嫁进了赤土乡，“有矿产，意味着生活条件不会差。”

“沿河的稻田无法种植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河水全都是泥浆，根本不能用于灌溉。”罗亨平说。

钟小花听老一辈人说，以前红桃岭很多地方会冒出清澈的山泉水。可她嫁到红桃岭组后，却从没见过山泉水的踪影，“听人说，是因为采矿掏空了地底”。

比河水变浑、泉水消失更严重的问题，是水质变得有毒。饶小明说，过去许多企业和村民在对钨矿、黄金进行加工提纯时都会用到硫酸和水银，含大量有毒化学物质的废水被直接排入赤土河，“后果就是河水汞含量超标，灌溉出的粮食也没人敢吃。”

2019年，在外漂泊20多年的朱英华回到南康钨矿的所在地，养起了蜜蜂。“我家多年前就迁到了这里，却没有一分土地。矿厂没了，我相当于是个‘黑户’。”朱英华嘴里开着玩笑，表情却有些苦涩——像不少过去的钨矿职工一样，多年来，他对生活一直都感到很迷茫。

“我们这批人，既不适应乡村，也不适应城市。”今年50岁的朱英华在南康钨矿出生、长大，他的外公外婆和父亲都是矿厂的职工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朱英华高中毕业后赶上招工，成了南康钨矿招聘的最后一批职工，“那时钨矿质量、数量都不如从前，厂子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

没过几年，朱英华离开钨矿外出务工。他辗转去广东、福建等地，但因为学历不高，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纸箱厂、汽配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打些零工。

“南康最有钱的大多是赤土人，做着最苦力工作的也大多是赤土人。”流传在赣南地区的这句话，是采矿淘金时代后赤土人的两种真实写照，只是前者数量稀少，后者却人数众多。

“过去老百姓不知道黄金在哪儿，也不知道如何开采，因此一直把民谣当玩笑听。”罗亨平说，当钨矿开采热度达到顶峰时，逐渐有一些黄金开采企业来到赤土尝试着挖掘黄金。随着黄金出土的消息不断传来，不少在钨矿折戟的村

民，又迅速投入到淘金热中。

杏花村的钨矿比不上三村，黄金资源却相对丰富。15岁那年，初中还没毕业的胡朝中辍学跟着哥哥们寻起了黄金，“那时候，在许多人看来，上不上学好像不重要，能赚钱就行”。

刚开始，淘金客都聚集在赤土河边，“拦截一小段河面，把水抽干，再把河底的泥沙挖个底朝天。”河里挖不出了，又转战到稻田里。到后来，还有淘金船开进赤土河抽沙，用球磨石把砂石碾碎再加上水银后选金。

胡朝中说，私人淘金一般都是同村亲朋组成一个小团伙，淘到了就大家一起分，“最多的时候，一天也就淘出四五十克，每个人分到手的并不多”。

挖矿、淘金带来的经济收益逐渐减少，可野蛮开采导致的巨大破坏才刚刚展露脸面。

接连好多年，三村村民都见不到绿色。或是为了挖钨矿，或是为了烧柴火，山上的植被被砍伐殆尽，目之所及全都是杂乱的黄土和裸露的岩石。流经整个乡镇的赤土河从三村发源，每当下雨天，大量泥土被雨水携卷进河中，从上游到下游全都浑浊不堪。赤土河因此有了“小黄河”的戏称。

就连饶丰提的终身大事，也是由钨矿牵的线。今年56岁的赖华秀本是南康区镜坝镇人，因为跟随采矿的叔叔来到三村，结识了饶丰提，最终在那里结婚生子，“当时嫁到三村，就像是现在嫁了个‘家里有矿’的人。”赖华秀说，那时候不少外村姑娘嫁进了赤土乡，“有矿产，意味着生活条件不会差。”

“沿河的稻田无法种植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河水全都是泥浆，根本不能用于灌溉。”罗亨平说。

钟小花听老一辈人说，以前红桃岭很多地方会冒出清澈的山泉水。可她嫁到红桃岭组后，却从没见过山泉水的踪影，“听人说，是因为采矿掏空了地底”。

比河水变浑、泉水消失更严重的问题，是水质变得有毒。饶小明说，过去许多企业和村民在对钨矿、黄金进行加工提纯时都会用到硫酸和水银，含大量有毒化学物质的废水被直接排入赤土河，“后果就是河水汞含量超标，灌溉出的粮食也没人敢吃。”

2019年，在外漂泊20多年的朱英华回到南康钨矿的所在地，养起了蜜蜂。“我家多年前就迁到了这里，却没有一分土地。矿厂没了，我相当于是个‘黑户’。”朱英华嘴里开着玩笑，表情却有些苦涩——像不少过去的钨矿职工一样，多年来，他对生活一直都感到很迷茫。

“我们这批人，既不适应乡村，也不适应城市。”今年50岁的朱英华在南康钨矿出生、长大，他的外公外婆和父亲都是矿厂的职工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朱英华高中毕业后赶上招工，成了南康钨矿招聘的最后一批职工，“那时钨矿质量、数量都不如从前，厂子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

没过几年，朱英华离开钨矿外出务工。他辗转去广东、福建等地，但因为学历不高，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纸箱厂、汽配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打些零工。

“南康最有钱的大多是赤土人，做着最苦力工作的也大多是赤土人。”流传在赣南地区的这句话，是采矿淘金时代后赤土人的两种真实写照，只是前者数量稀少，后者却人数众多。

“过去老百姓不知道黄金在哪儿，也不知道如何开采，因此一直把民谣当玩笑听。”罗亨平说，当钨矿开采热度达到顶峰时，逐渐有一些黄金开采企业来到赤土尝试着挖掘黄金。随着黄金出土的消息不断传来，不少在钨矿折戟的村

民，又迅速投入到淘金热中。

杏花村的钨矿比不上三村，黄金资源却相对丰富。15岁那年，初中还没毕业的胡朝中辍学跟着哥哥们寻起了黄金，“那时候，在许多人看来，上不上学好像不重要，能赚钱就行”。

刚开始，淘金客都聚集在赤土河边，“拦截一小段